

中国智慧集萃丛书
ZHONGGUOZHUIHUI JICUI
CONGSU

主编 冯天瑜



兵家韬略

何晓明 编著

湖北教育出版社

中國書畫報 2011 年 11 月 11 日
第 1111 期
第 1111 期

民族藝術

2011 年 11 月 11 日

第 1111 期

兵家韬略

何晓明 编著

中国智慧集萃丛书

ZHONGGUOZHILU JICUI CONGSHU

湖北教育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兵家韬略/何晓明编著. — 武汉:湖北教育出版社,1996

(中国智慧集萃丛书)

ISBN 7-5351-1902-6

I. 兵… II. 何… III. 兵法-中国-古代 IV. E8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22382 号

出版
发行:湖北教育出版社

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
邮编:430022 电话:5830435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文字 603 厂

(441021·襄樊胜丰路45号)
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
5 插页 10.5 印张

版 次:1996 年 10 月第 1 版

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:237 千字

印数:1—10 000 册

ISBN 7—5351—1902—6/G·1546

定价:14.40 元

如印刷、装订影响阅读,承印厂为你调换

《中国智慧集萃丛书》总序

冯天瑜

时代的步履正雄健地逼近 21 世纪门槛。现代文明如日东升，展示出辉煌灿烂的前景，同时又面临着超乎往昔的复杂而尖锐的挑战。

站在现代文明的巨厦之上，昔时的文明成就似乎相形见绌，正所谓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”昔时曾经遭遇过的困境与今日面临的问题相比，似乎也是小巫见大巫。

然而，立足现代高处的人们不要忘却，文明史是一个渐进的积淀过程，任何一项新成就，无不依凭过往奠定的底蕴；今人实现对往昔的超越，正是踏着往昔这块起跳板。因此，锐意进取的人类，力图克服现实困境的人类，需要回首往昔，神交古人，听取历史这位导师的谆谆教诲。

两千多年前的孟夫子深悉此中奥秘，他告诫弟子说：

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，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，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。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，又尚论古之人。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

论其世也。是尚友也。^①

这番话的要旨，在劝导人们不仅要向当代优秀人物学习，还要追溯历史，与古人交友。而与古人交友，又必须知人论世，从了解古人所处的时代入手。这种依托历史积淀的学习方法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求贤获智的高妙境界。

中国的古圣先贤为我们留下极其丰富的智慧，从立身做人的德行准则，到处世创业的韬略谋划；从莘莘学子的学规学训，到官吏奉守的箴言；从人生哲理到家训家规，古人无不极深研几，富于创意，只要我们含英咀华，“口咏其言，心惟其义”^②，不难有所收获。当然，今人向古人求取智慧，一要谦逊，“虚心而往”，方能“实腹而归”；二要创造，不能满足于做“立地书橱”，一味记诵，成为“古人奴隶”，而应当对古代文本加以现代人的创造性诠释，所谓“学贵心悟”^③，“师其意，不泥其迹”^④，这才是“神交古人”的精义所在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国古人的智慧，不仅是中国人的财富，而且也为域外所借重。君不见，《易经》成为德人莱布尼茨创立二进制数学的启示；《老子》的“有生于无”哲言提供西方建筑大师的灵感源泉；《三国演义》是日本企业家从事商战的指针；美军将帅在海湾战争中星夜披阅《孙子兵法》，“声东击西”是其赢得胜算的主要策略……。外人研习中国智慧，并取得现实成绩，确乎使国人闻之而怦然心动

① 《孟子·万章下》。

② 韩愈：《上襄阳于相公书》。

③ 张载：《经学理窟·学大原下篇》。

④ 戚继光：《纪效新书·束伍篇》。

——难道我们不应当以加倍的热情继承和发扬中国智慧，在现代国际竞争中创造全新的业绩吗！

中国素以典籍丰富著称于世，我们站在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四库全书》面前，每每震其浩博，而曾经如游龙飞凤般生动展开在历史过程中，植根于庶民百姓，升华于士子精英间的“中国智慧”，大都记录在籍。唯其因为这些典籍“浩如烟海”，而显示出“中国智慧”的丰饶；又因为这些典籍“浩如烟海”而令今人“望洋兴叹”。为了给学习者提供便利，减免“亡羊歧路”的迷茫，我们从“中国智慧”涉及到的各个侧面，分别纂集精要论说，组成《中国智慧集萃》书系，意在取精用弘，使读者手持一卷，春诵夏弦，即可获得中国智慧某一方面的大要。当然，若想沿着“中国智慧”升堂入室，则需要从知行两方面潜下心来，所谓“学道当如穿井，井愈深，土愈难出，非坚其心正其行，岂得见泉源也。”^①

编者愿与读者诸君共同穿井探源，弘扬中国智慧，以无愧于古人，又决不逊色于学习中国智慧的外人。

① 张君房《云笈七签》。

目 录

《中国智慧集萃丛书》总序[1]

前言 兵家韬略与中国智慧[1]

一 战争论[11]

1. 兵所自来者久矣[13]
2. 兵者,凶器也[16]
3. 以战去战,虽战可也[24]
4. 兵者,外以诛暴,内以禁邪[26]
5. 兵之胜败皆在于政[42]
6. 天时不如地利,地利不如人和[54]

二 军备论[60]

1. 国之大务,莫先于戒备[62]
2. 国富者兵强[68]
3. 寓兵于农[73]
4. 师行粮从,军需最要[77]
5. 兵矢者,军之神灵也[85]

三 战略论[91]

1. 用兵之道,先正其礼,次渊其谋,次择其人[93]

2. 论敌察众[110]
3. 计必先定于内,然后兵出乎境[128]
4. 因机而立胜[138]
5. 兵者,诡道也[154]
6. 不战而屈人之兵[171]

四 战术论[177]

1. 攻伐之术[179]
2. 守备之术[200]
3. 择地之术[206]
4. 侦察之术[214]
5. 众寡相敌之术[225]

五 将帅论[230]

1. 将材有九[232]
2. 较形与势不如较将之智能[248]
3. 大将受任,必先料人[258]
4. 用兵之害,犹豫最大[261]
5. 祸莫大于轻敌[263]
6. 以父母之心,行将帅之事[265]
7. 将在军,君命有所不受[270]
8. 猛将必发于卒伍[278]

六 士卒论[280]

1. 简选精良[282]
2. 用百万如役一人[293]
3. 三军一心[304]
4. 缘法而治,按功而赏[311]
5. 胆贵壮[319]
6. 军容不盛,军威不张[323]

前言 兵家韬略与中国智慧

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孕育出了光彩卓绝的中国智慧。

这里所说的“智慧”，不仅仅是指知识、技巧、才能，它的更根本含义还包括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思维途径、认知方式乃至价值观念、人生态度、社会理想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中国智慧也可被认为中国文化的主干或内核。

文化史研究表明，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，中国智慧在农艺、天算、医学，特别是军事领域，获得了尤其长足的发育。正因为如此，本世纪40年代的文化反省中，雷海宗、林同济合作写出了意味深长的学术专著《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》；本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反省中，李泽厚着重强调：“中国四大文化（兵、农、医、艺）与培育中国智慧形式有关系”^①。

但是，具体而论，古典军事学与中国智慧之间，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，雷、林、李及诸学界前贤，并无详论面世。笔者在承接《中国智慧集萃丛书》之一《兵家韬略》的编撰任务后，搜求爬梳，条分缕析，探赜索隐，感受良多，权且提出如下浅识，以求方家指正。

^① 参见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·试谈中国的智慧》。

一、重整体之“势”

从思维方式上看,中国智慧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注重整体,长于综合,追求统一。与西方智慧亟亟于探究“此岸”与“彼岸”、物质与精神、灵魂与肉体的本质区别不同,中国智慧更乐于以笼统、直观的方式,论证“天人合一”、“知行合一”、“情景合一”,体现出一种朴素的整体思维的优长。

这一优长,在古代兵家的韬略中,具体化为对“势”的注重与阐发。兵家始祖孙武论道:“故善战者,求之于势,不责于人,故能择人而任势”。“任势”,就是强调从总体上把握胜利的枢纽,而不仅仅矚目于战役布署、战术技巧等细节,“故善战人之势,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,势也”。^①宋代军事学家许洞又进一步说明:“势之任者有五:一曰乘势,二曰气势,三曰假势,四曰随势,五曰地势”^②,既要扬威猛进,鼓足士气,又要善布疑兵,还要抓住战机,巧用地形。“用兵者乘此五势,未有不能追亡逐北以建大功也”。

战争是关乎天文、地理、人事的庞大系统工程,所以自古以来,便有“天阵,地阵,人阵”^③之说。古代兵家将三者统一于“势”的把握之中:“夫行兵之势有三焉:一曰天,二曰地,三曰人。天势者,日月清明,五星合度,慧孛不殃,风气调和。地势者,城峻重崖,洪波千里,石门幽洞,羊肠曲沃。人势者,主圣将贤,三军用礼,士卒用命,粮甲坚备”^④。既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全面而非单一的,综合而非支离的,所以兵家强调:“夫竭三军气,夺一

① 《孙子·势篇》。

② 《虎铃经·任势》。

③ 《六韬·虎韬·三阵》。

④ 《诸葛亮集·将苑·兵势》。

将心，疲万人力，断千里粮，不在武”，单靠武力是不行的。“智周万物而不殆，曲成万物而不遗”^①，只有总体谋划，宏观决策，综合分析，统筹调度，才能克敌制胜。

“智周万物而不殆，曲成万物而不遗”，这就对军事统帅的素质，提出了全面的、高标准的要求。“用兵之道，先正其礼，次渊其谋，次择其人，然后详天地之利害，审人心之去就，行赏罚之公，慎喜怒之理，择进退之地，张攻伐之权，明成败之图，度主客之用”^②。要驾驭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，军事统帅当然不能是徒具匹夫之勇的莽汉鲁夫，而应该是具有广阔视野，全局胸怀，文武兼备，智勇双全的“通才”。《六韬·龙韬》提出“将有五材”：勇、智、仁、信、忠；吴起告诫“将之所慎者五”：理、备、果、戒、约；诸葛亮认为“将材有九”：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步、骑、猛、大；说法各异，宗旨则一：只有加强综合修养，提高整体素质，才能造就优秀将帅。

立足于重“势”的整体思维，古代兵家对于战争终极目标的确定，也有卓异见解。战争以夺取最终胜利为目标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问题是对“胜利”如何界定，如何判别。古代兵家认为，从整体上(包括精神气势、军备器械、军队数量、将帅素质、国家财力、外交关系诸多因素)彻底压倒敌人，迫使其放弃抵抗，较之斗智、斗勇、斗力，浴血搏杀，使敌降服，是更为完美的胜利。“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”，“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”^③。这种对于“全胜不斗，大

① 《太白阴经·人谋下·沉谋》。

② 《虎铃经·军谋》。

③ 《孙子·谋攻篇》。

兵无创”^①境界的追求,是古典军事学的重要精华所在,也是中国智慧整体思维特征的典范体现。

二、因辩证之“机”

与整体思维模式相关,中国智慧的辩证法,也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。简要地说,它是实用的辩证法而不是概念的辩证法,是互补的辩证法而不是否定的辩证法。“它的重点在揭示对立项双方的补充、渗透和运动以取得事物或系统的动态平衡和相对稳定,而不在强调概念或事物的斗争成毁或不可相容”^②。

古典军事学,是中国传统辩证法体现得最透彻、精粹的学科领域,而“正”与“奇”,则是古代兵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对辩证法范畴。“善用兵者,无不正,无不奇,使敌莫测,故正亦胜,奇亦胜”^③;“以奇为奇,以正为正者,胶柱调瑟之士也。以奇为正,以正为奇者,临书模画之徒也。我奇而示敌以正,我正而示敌以奇者,知胜者也。我奇而敌不知其为奇,我正而敌不知其为正者,知胜之胜者也”^④。

如果单纯从字义概念上刨根问底,奇与正的辩证法似乎并不太容易讲得清楚。但是,如果我们能从中国智慧的特点出发,从把握胜负因素动态平衡的角度去理解,便可以找到古典军事辩证法中体现中国智慧的闪光之点:“因机而立胜”^⑤。

关于“因机”与“奇正”用兵之术的关系,明人何良臣有一段话颇为精辟:“得机略者,不逼人之穷,不攻人之锐,不启人之未

① 《六韬·武韬》。

② 李泽厚: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,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,第304页。

③ 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·卷上》。

④ 《投肤笔谈·兵机》。

⑤ 《诸葛亮集·将苑·机形》。

及。必因其盛而致之弛，击其虚而待其废，取其无备而疾袭其迟。是以用兵之术，惟因字最妙。或因敌之险以为己固，或因敌之谋以为己计，或因其因而复变用其因，或审其因而急乘其所因。则用因而致胜者，不可言穷矣”^①。

显而易见，所谓“惟因字最妙”，就是说把握“奇”与“正”的辩证关系，要害在于因人、因地、因事而制宜，切不可死背兵法条文。这方面的经典，可见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：韩信背水列阵，大破赵军，便是依据“陷之死地而后生，置之死地而后存”的法则，活用兵法，一反“右倍山陵，前左水泽”的惯例而用之，既正而奇，既奇而正，最终大获全胜，令诸将钦佩不已。

战场局势千变万化，辩证之“机”无所不在又无所不在。古代兵家在丰富实战经验的基础上，总结归纳出若干规律。吴起称：“凡兵有四机：一曰气机，二曰地机，三曰事机，四曰力机”^②，分别从指挥调度、扼守要塞、离间敌营、训练士卒等方面阐明“因机”的重要意义。明人西湖逸士以“无常”来释“兵机”：“主客无常态，战守无常形，分合无常制，进退无常度，动静无常期，伸缩无常势。出没变化，敌不可测，此之谓兵机”^③。清人揭暉论“机”，更为精审：“势之维系处为机，事之转变处为机，物之紧切处为机，时之凑合处为机。有目前即是机，转瞬即非机者；有乘之即为机，失之即无机者。谋之宜深，藏之宜密。定于识，利于决”^④，不仅点出“机”之所在，而且指明“因机”之乘、失有诀，“谋机”之宜深宜密，言简意赅，启人心智。

① 《阵纪·因势》。

② 《吴子·论将》。

③ 《投肤兵谈·兵机》。

④ 《兵经百篇·智篇·机》。

古典军事学中涉及辩证法的内容,精彩纷呈,美不胜收。如讲擒纵予夺之计,有《老子·三十六章》的“将欲歛之,必固张之;将欲弱之,必固强之;将欲废之,必固与之;将欲夺之,必固予之”;讲战与非战之分,有《商君书·画策》的“以战去战,虽战可也;以杀去杀,虽杀可也”;讲敌我胜负之数,有《孙子·形篇》的“不可胜在己,可胜在敌。故善战者,能为不可胜,不使敌之可胜”;讲智愚勇怯之度,有《六韬·武韬》的“大智不智,大谋不谋,大勇不勇,大利不利”;讲立功争胜之道,有《兵经百篇·智篇》的“无功之功,乃为至功;不争之争,乃为善争”;等等。如果将这些论述提升到认识论、方法论高度来剖析,宋人何去非的如下总结,颇能画龙点睛般地凸现兵家韬略所蕴含的辩证法精髓:“事物之理,可以情通,而不可以迹系。通之以情,则有以适变而应乎圣人所与之权;系之以迹,则无以制宜而入乎圣人所疾之固。是以天下事攻之成,常出于权,而其不济,常主于固。”^①

三、贵人伦之“和”

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^②,中国智慧因而尤其注重人际关系的调节、和谐,注重仁义道德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价值与功用。这甚至在军事领域内,也得到了强有力的贯彻。

《荀子·议兵》记录了陈嚣与荀况之间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:

陈嚣问道:“先生议兵,常以仁义为本。仁者爱人,义者循理,然则又何以兵为?凡所有兵者,为争夺也!”荀子回答:“非汝所知也。彼仁者爱人;爱人,故恶人之害之也。义者循理;循理,故

^① 《何博士备论·邓艾论》。

^② 参见冯天瑜等著《中华文化史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,第232页。

恶人之乱之也。彼兵者，所以禁暴除害也，非争夺也。”

在一般人看来，刀兵相交，生灵涂炭，似乎与道德伦理毫不相干。但是在中国智者眼中，议兵与议政并无区别，同样要“以仁义为本”！正因为如此，在先哲议兵的诸多著述中，有关仁义道德的内容，占了相当大的篇幅。“圣人之用兵也，亡国而不失人心，利泽施乎万世”^①；“攻伐之事，未有不攻无道而伐不义也”^②。在以仁伐不仁、以义伐不义的前提下，尽管战争本身必然造成伤亡和毁灭，但其最终结局，仍然是符合中国文化的伦理原则的。其中的道理就在：“故夫兵，虽非备道至德也，然而所以辅王成霸”^③。大军所向，“克其国不及其民，独诛所诛而已矣”，对于敌国的民众，仍以仁义为怀，“举其秀士而封侯之，选其贤良而尊显之，求其孤寡而振恤之，见其长者而敬礼之”^④，这才是仁义之战，仁义之师。

如果说兵争之事对于敌国民众尚且应该以仁义为本，以和为贵，那么，对于己方军民来讲，就更应该将“人和”置于首要地位了。吴起提出：“不和于国，不可以出军；不和于军，不可以出阵；不和于阵，不可以讲战；不和于战，不可以决胜”^⑤。孟子总结出中国军事学的著名命题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^⑥。诸葛亮进一步申言：“人和则不劝而自战矣”，否则，“将吏相猜，士卒不服，忠谋不用，群下谤议，谗愿互生”^⑦，必败无疑。

- ① 《庄子·大宗师》。
- ② 《吕氏春秋·振乱》。
- ③ 《管子·兵法》。
- ④ 《吕氏春秋·怀宠》。
- ⑤ 《吴子·图国》。
- ⑥ 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。
- ⑦ 《诸葛亮集·将苑·和人》。

谋求“人和”，君主应对前线将帅予以充分信任，使其拥有完全的决策自主权，“上不制于天，下不制于地，中不制于人”^①，而将帅回报这种信任的最好方式，则是“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”^②。只有“无主于后”，方可“无敌于前”^③，君主与将帅之“和”，妙在其中矣。

谋求“人和”，友邻部队之间，理应和衷共济，相互体谅。曾国藩论道：“欲求和衷共济，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。人之好名，谁不如我。同打仗，不可讥人之退缩；同行路，不可疑人之骚扰。处处严于治己而薄责于人，则唇舌自省矣”^④。

谋求“人和”，说到底是实现部队意志的高度统一，“用百万如役一人”^⑤，“三军一心则令可使无敌矣”^⑥。做到这一点，“缘法而治，按功而赏”^⑦固然是相辅相成的两手，但古代兵家更强调的，却是将帅须行“拊循之道”，将血亲人伦的道德准则，溶入军队内部的人际关系之中，“饥寒困乏，如以身尝，疾病医药，亲临诊视，解衣推食，哀死问孤，殍殍吮伤，恩逾骨肉”。要而言之，“以父母之心，行将帅之事，则三军欣从，万众咸悦”^⑧，“人和”于是转化为无坚不摧的战斗力的，大显神威。

四、循实用之“理”

实用理性（或称实践理性）是中国文化的特殊品格。与此相

- ① 《尉繚子·武议》。
- ② 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。
- ③ 《尉繚子·武议》。
- ④ 《曾胡治兵语录·和战》。
- ⑤ 《何博士备论·汉光武论》。
- ⑥ 《吕氏春秋·论威》。
- ⑦ 《商君书·君臣》。
- ⑧ 《草庐经略·卷一·拊循》。